國共內戰美國的介入及其對華政策

唐明輝

服務單位：南亞技術學院

摘　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美國派遣馬歇爾至華，接續調處國共內戰；未久，國共力量優劣易勢。一九四九年八月，美發表「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將中國大陸喪失的責任推給中國政府領導人蔣介石。杜魯門總統基於其國家利益，發表「白皮書」前的四月份，即命駐華使節司徒雷登，續駐原地，試與中共接觸、建交。此【介入】中國事務的對華政策，影響我中華民國國家安全甚鉅，甚至造成中國易幟，中國共產黨建政。

關鍵詞：開羅會議、馬歇爾、司徒雷登、國共停戰協定、對華政策白皮書

*通訊地址：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二路 15 之 30 號 10 樓
電　　話：02-24525287　手機：0922127088
電子郵件：august@.nanya.edu.tw

CIVIL WAR IN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US'S INVOLVEMENT AND POLICY TOWARD CHINA

Tang-Ming Hui

Abstract

AfterThe Second World War ended, the US dispatched George C.Marshall to China, continued to mediate the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ies civil war; Not long time,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ies strength fit and unfit. In August, 1949, the US published “The China White Paper”－ losed mainland China the responsibility pushed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leader Chiang Kai-Shek. President Truman based on its national interest, before the publication “the white paper” in April, namely life diplomatic agent John Leighton Stuart stationed in China, tried to contact, established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is involvement－The Chinese business's policy toward China, affected Republic of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to be really great, even caused China changed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established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Key word: Cairo Conference, George C.Marshall, John Leighton Stuart, Kuomintang and Communist Party's ceasefire agreement, policy toward China－the white paper.

*通訊地址：基隆市七堵區明德二路 15 之 30 號 10 樓
電　　話：02-24525287　手機：0922127088
電子郵件：august@.nanya.edu.tw

壹、前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蔣介石領導的中國國民政府，在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思維中，是擔任戰後牽制蘇聯勢力擴張與抑制日本再起的角色，卻未能如願。緊接著，國共內戰又重新開啟，美國亦參與調停的工作。然而從一九四七年開始，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與中國共產黨之間隨著國內外環境的時移境遷，彼此勢力消長甚為迅速，終至中國大陸易手而為中共取代，其間又是哪些因素造成？‘美國介入或稱干涉中國內戰期間，又是如何扮演調停人的角色？因為對一個傾其全國力量，對抗比其各方面力量強大的日本十四年（一九三一年的九一八事變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止）侵華戰爭的國民政府而言，戰後在一片哀鴻遍野、斷垣殘壁、亟需休養生息，甚至急需美國此世界上唯一最強大的國家，在各方面給予援助的緊要時刻，美國的對華政策與態度，甚至其對國共的看法與傾向，對國民政府政權的穩定與否，都有關鍵性的影響。

一九四九年八月，國共間內戰可說到了勝負已定的態勢；美國對華的外交政策，於是時，在其國家利益的考量之下，又作了哪些調整？而這個調整，對國民政府而言，是一沉重的打擊，而中共又如何回應的呢？順著以上簡要的史實敘述，茲以【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國共內戰與調停】、【國共勢移與接觸背棄】等三節來探討、論述。

一、美國對中國的認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珍珠港，掀起了太平洋戰爭的序幕，次日，美國向日本宣戰，英國、中國、荷蘭亦相繼向日本宣戰。由於中國從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始，即單獨地對抗日本，因而在對日抗戰中，發揮了長期龐大的牽制作用。美國為了希望得以全力對付歐戰起見，於是在激勵中國繼續抗日的情況下，乃於一九四二年十月通知國府，聲明美國願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及其他相關權益。次年一月，中美、中英分別簽訂平等條約，同時，美國國會也投票廢除驅逐中國移民的排華法案。另外，羅斯福認為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很重要，因為他期望中國在戰後能夠扮演維持國際和平與區域安全的角色〈陳毓鈞「美國與台灣的歷史關係，頁 13」〉。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蔣介石接受羅斯福邀請，參加美、英、中三國領袖的「開羅會議」。在會中，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討論戰後遠東問題。羅斯福同意蔣的要求，將原為中國的領土歸還，因此，「開羅宣言」主張將「滿洲、台灣、

澎湖歸還中國，並恢復朝鮮之自由與獨立」。「開羅宣言」的內容，隨後在伊朗德黑蘭會議中，也獲得蘇聯領導人史達林（Josef Stalin）的同意。中國首度以世界四強之一的身份，出現於國際舞台。英國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對於羅斯福大力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甚表不解並提出質疑，羅斯福則解說是為了讓中國在戰後於遠東成為抵禦蘇聯勢力的有效平衡力量〈陳毓鈞「美國與台灣的歷史關係」，頁 19〉。

羅斯福之所以主張將日本侵略的領土歸還中國，主要的原因有三〈資中筠「中美關係台灣問題之由來」，頁 19〉：

(一)堅定蔣介石抗日的意志，避免中日妥協的可能；

(二)防止日本於戰後再度成為軍事強權，而使中國成為看守日本的力量；

(三)促成中國成為美國的戰略夥伴，以配合美國牽制蘇聯在亞洲的擴展。

羅斯福對戰後中國扮演的角色期望，隨著其逝世與戰後末期國共間又爆發衝突而破滅；繼羅斯福成為美國總統的是民主黨的杜魯門（Harry S.Truman），美中關係開始有了巨大的改變。此時，美國內部對國民政府的態度出現了差異。美國政府官員對中國政府的態度，大致可以分成兩派；一派對國民政府有反感，認為它是一個腐敗、落伍與無效率的政府，因而不願意給予毫無保留的支持，採取這種立場的有杜魯門及剛卸任的陸軍參謀總長馬歇爾（George C. Marshall）將軍，國務院副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及遠東司司長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等人(邵玉銘─1945 至 1949 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 4」)。

另一派則對國民政府採取同情的態度，認為經過八年抗戰，國民政府已是精疲力竭，不能過度苛求，因此認為美國應該支持國民政府。這一派人士對中共較不存幻想，認為美國不可以支持中共，代表人物有駐華大使赫爾利（Patrick J. Hurley）將軍，駐華最高軍事首長魏德邁（Albert C. Wedemeyer）將軍，杜魯門之白宮參謀長李海（William D. Leahy）上將等人〈邵玉銘─1945 至 1949 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 4〉。

至於戰後中國局勢，美國最關心的是如何解決國共間的紛爭。大約自一九四三年後，美國政府對國民政府的觀感與態度已日漸不良，而美國駐華外交及軍事人員在其工作報告中，對國民政府亦多加批評。對於中共，這些人士則是譽多於毀；他們認為中共雖是共黨份子，但與蘇聯並無直接關係；且認為中共雖是一批農民改革份子，但非一般邪惡的政治勢力〈邵玉銘─1945 至 1949 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 5〉。在這些看法影響下，美國政府戰後原則上固然繼續支持國民政府，但已非毫無保留；對中共雖有一些疑慮，但並不認為必須加以

消滅 。因此，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是雙重的，一方面協助國民政府重建政權及收復東北；例如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以後，美國政府將總數近五十萬的國府軍隊，運往華東與華北，各地美軍亦進佔北平、天津等地，以協助國府對該地區的接收。但在另一方面，又規定其對華的各種軍事援助，不得用來內戰以消滅中共〈邵玉銘─1945 至 1949 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 5〉。

在此情形下，國共之間的紛爭又怎樣解決？首先美國政府反對國府以軍事行動消滅中共。他們認為國府本身腐敗，一般國民黨以外人士對政府不滿，加上經過八年抗戰，中國百姓不會支持此一內戰。在這種情形下，國府不僅沒有得勝的把握，甚至在長期內戰下，將會造成經濟崩潰，反而促進中共之發展，因此，美國堅決反對國府進行勦共，更不願意以其軍力支援〈邵玉銘─1945 至 1949 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 6〉。

另外，美國尚有一顧慮，就是顧忌其在華軍事行動，會引起蘇聯採取同等之軍事干預，去協助中共對抗國民政府。美蘇如採取此種行動，則美蘇兩國很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未久，即在遠東發生武裝衝突，進而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是美國極力避免、不願意見到的〈邵玉銘─1945 至 1949 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 6〉。以上的史實陳述即是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韓戰爆發前，對中國內部國共內戰、國共兩黨的觀感與印象。

貳、國共內戰與調停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十個月（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六年六月），國共之間雖有衝突，但內戰並未全面爆發，主要的原因有三〈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53~456〉：

一、美國限制國府，蘇聯限制中國共產黨，並希望國共組成聯合政府，不要以武力爭勝負。美國派遣馬歇爾接替赫爾利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在中國調解國共糾紛； 蘇聯僅支持中共在東北地區發展，以鞏固蘇聯在東北的特殊利益；

二、美國調解之初，國共雙方均能自制，期間，召開協商會議，成立三人軍事小組（國府代表張群、中共代表周恩來與美國特使馬歇爾），對增加政府和諧、減少軍事衝突，均有幫助；

三、中共有鑑於抗戰勝利之初，國民黨的聲勢，又有美軍協助接收，故在東北托護於蘇軍，並在華北、華中均採退守方針。

但隨著戰後經濟的惡化，接收措施喪失民心，國府又希望在局勢稍趨穩定，

能迅速解決中共問題，於是在馬歇爾調停中途，爆發了全面戰爭。從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國府軍隊採取攻勢，共軍採取守勢；一九四七年七月，毛澤東將此種守勢戰略定名為「內線作戰」，主要的目的在防守已控制之解放區。此期戰爭可分為兩個階段：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為第一階段。國府軍隊攻擊的目標有六個：中原解放區、華東解放區、晉冀魯豫解放區；晉綏、晉察冀解放區及東北解放區等。一九四七年三月至六月為第二階段，國府軍隊對兩個地區的共軍進行攻擊〈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53~456〉。

在此，馬歇爾使華調停的背景有必要交代，因為他對國共勢力的消長與國府的命運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一九四五年七月，杜魯門和史達林在波茨坦進行會談時，美國代表團一致認為史達林要求在戰後控制滿洲的企圖不合理，不僅危及美國傳統的中國門戶開放政策，且讓中國東北和華北都有可能成為蘇聯的勢力範圍〈陳毓鈞〈美國與台灣的歷史關係，頁 13〉。

八月六日，第一枚原子彈投落廣島，八日蘇聯對日宣戰，九日第二枚投落長崎，蘇軍趁機直入滿洲，十四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此時，國共關係持續惡化，美蘇關係也在惡化當中。而美國軍方人士都對蘇聯佔領滿洲感到不安，並懷疑史達林干預中國內政和扶植中共〈邵玉銘《中美關係論文集》，頁 46〉。因此，杜魯門衡量形勢，迅速派遣馬歇爾作為特使以接替辭職的赫爾利（駐華調解時間從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八日至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曾於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七日至延安 陪同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於重慶從事和平談判），前往中國進行。美國人有尊重少數派的習慣，所以馬歇爾到重慶後即聽取中共代表周恩來及民主同盟等人士的意見。接著馬歇爾提出三項建議〈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691〉：

(一)國府與中共應停止敵對行為；

(二)共軍吸收於國府軍隊內，按相對實力定比例；

(三)召集國民黨、共產黨、各獨立派系的全國性會議，以結束國民黨訓政，並建立聯合政府。同時表示，國共雙方若能達成協議，美國即給予中國五億美元經濟援助，否則即作罷論。

馬歇爾使華的政策目標在促成國共成立聯合政府（先前赫爾利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七日向毛澤東提出五點談判方案，毛則要求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和平解決紛爭；一方面可促使中共減少對蘇聯的依賴，二方面美國仍可繼續保持對中國的影響〈邵玉銘《中美關係論文集》，頁 47〉。美國主張成立聯合政府還有一邏輯思維，它認為中共不參加國府而留在外面，則勢必成為一個叛亂勢

力；但若進入國府裡，則經過一個長期憲政階段，也許可以把中共感化為一股民主的政治勢力，這樣中國也許可以慢慢地發展成一個民主的國家〈邵玉銘，1945至1949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頁6〉。

馬歇爾調處國共內爭，自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共經歷三個階段（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開始，共舉行了六次會議，國共達成第一個停戰協議，並於一月十日於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三月初馬歇爾返美述職，中共不顧停戰協定，在東北展開全面攻擊。六月六日，國府頒佈了第二個停戰令，三小時後東北共軍即向國府軍隊進攻。後為促使中共參加國民大會，並恢復協商，蔣介石於十一月八日頒佈第三道停戰令。其間中共策動反美運動，攻擊、襲擊在華美軍，造成馬歇爾牽怒國府，建議杜魯門停止出售剩餘軍火予國府；另中共策劃【沈崇案】以激起廣泛的反美運動等等）。由於中共使用和談與軍事攻擊相互運作的策略，以及馬歇爾對國府的施壓與中共反覆地違反停戰協定，在國共雙方各有圖謀，積怨太深，且打打談談的情況下，和談徹底破裂，馬歇爾只好宣告調處失敗〈屠傳德，《美國特使在中國》，頁 34〉，乃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八日離華。於離華前夕發表聲明，將失敗責任歸之於國民黨內反動集團以及共產黨內的極端份子。

馬歇爾離華後，國共局勢又有新的變化。 自一九四七年六月開始到一九四八年六月一年間，共軍在毛澤東之指揮下，採取了攻勢作戰戰略，國府軍隊則或攻或守。在一九四七年九月，毛稱此攻勢戰略為「外線作戰」，即把戰場引向國府控制的地區。此期間，國共間的主要戰場有五：其一為中原戰場；其二為西北戰場；其三為華東戰場；其四為晉察冀、晉冀魯豫戰場；其五為東北戰場。而國共兵力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前後，比例從 1.9：1 至一九四八年六月前後，比例反成為 1.3：1〈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57~458〉，[1]雙方兵力消長甚為快速。

由上述內容來看，國府與中共在抗日戰爭末期長達四年的內戰，美國先後派遣了兩位特使介入調停，除赫爾利不滿美國國務院內親共份子對其調解多方制肘，辭去駐華大使外，馬歇爾則是失敗收場回美。國共在馬歇爾調解期間，從開始馬歇爾似乎即受到其對中共存有好感的影響，因此，美國介入中國內戰，調解國共軍事衝突，在立場上自然並不能完全公正；就其對國共的態度言之，偏頗中共也就不足為奇了。根據前文，筆者有下列三點看法：

(一)大黨與小黨聯合組成政府，是西方政黨政治理論與實踐的運作，但對於中國

共產黨這一擁有「武力」的政黨集團，其適用性是否合宜？

(二)美國主張國共成立「聯合政府」，是否受到毛澤東及美國理想主義的影響，而成為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一種外交政策？

(三)國共間「停戰協定」的簽訂，綁住了國府的手腳，卻未能綑住中共使之遵行，美國是否需負最大的責任？

參、國共勢移與接觸背棄

前面論述到，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間，國府軍隊對解放區進行攻擊，共軍以防守為主，部份解放區為國府軍隊收復。一九四七年六月至一九四八年六月這一年的戰爭，共軍改採攻擊戰術，部份國府軍隊駐守的區域為共軍所佔。兩年之間，雙方駐守的區域均有失而復得、得而復失的情形。從軍事大局來看，這兩年的戰爭，雙方旗鼓相當，但共軍的數量已逐漸與國府軍隊接近，而國府在經濟、政治上的難題，使得民心大失，中共遂乘機擴大了社會方面所謂的第二戰線〈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68~469〉。在這種情形下，共軍已有準備與國府軍隊進行決戰的計劃。從一九四八年六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共軍開始進攻濟南、遼瀋、徐蚌、平津、皆穫全勝，使國府軍隊精銳盡失，只能憑長江之險，守上海、南京、武漢一線〈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68~469〉。

在前述四大戰役中，共軍的戰略是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先發動遼瀋戰役；在戰役中先下錦州，以割斷平津地區國府軍隊與遼瀋地區國府軍隊間的聯繫。九月十六日，攻下濟南，以割斷平津地區國府軍隊與徐蚌地區國府軍隊的聯繫，然後再各個擊破徐蚌地區與平津地區的國府軍隊〈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頁 468~469〉。而雙方兵力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相比，則是國府軍隊有一百五十萬人，共軍則是一百六十萬人，後者已超過了國府軍隊〈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719〉。

中共勢力何以發展如此之快速？根據一份資料來看，從一九四七年開始，就已見端倪。前面述及國共內戰至一九四七年秋季後，共軍對國府軍隊全面發動攻勢；此時的共軍，東北有林彪，黃河下游有劉伯承，山東東部有許世友，西部有陳毅，河南西部有謝富治，陝西北部有彭德懷，另有羅瑞卿、徐向前等亦在華北各地攻城掠地〈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719〉。中共的全面攻勢，使國府軍隊自此由優勢轉為劣勢，其因約有下列六點〈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707〉：

一、中共與蘇聯訂立「哈爾濱協定」（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簽定），援助增強，武器裝備源源而來；

二、中共控制農村，在農村實施「平分土地政策」，以示好農民，因而掌握了廣大的兵源；

三、中共擅長破壞交通，不僅使國府軍隊的重裝備難以運動，且使所據守的城市之間彼此失去聯絡，因而陷於孤立；

四、戰後經濟蕭條，通貨膨脹，社會不安，影響了民心士氣；

五、國府實施訓政後，政治上有不少失意份子；實施憲政前後，各方人士為了政治理想和權力分配等問題，又復紛爭；

六、抗戰勝利後，國府實施裁軍，以及裁後安頓等問題，都引起不滿，負氣投共者不少。

接著前文所述，正當國共在徐蚌會戰進行激烈、國府軍隊轉趨劣勢後，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國府內外發生一片和談之聲；和議發於「華中勦匪總司令」白崇禧和湖南省主席程潛於十二月二十五日，電請政府與中共和談，程潛並要求蔣總統下野。在當時有一種流言，以「非蔣總統下野則美援不來」、「非蔣總統下野則和談不能進行」，蔣介石遂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總統職。和議原先定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經由當時尚未辭去總統的蔣介石同意行政院派官員與中共進行和談，但為中共所拒，反要求國府投降，並於十四日提出逼降條件八條，要點如下〈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711、713〉：

一、政府應即下令停戰；

二、廢止現行憲法；

三、成立民主聯合政府；

四、懲辦戰犯；

五、施行土地改革；

六、取消中美間條約；

七、立即召開各黨各派的新政協會議；

八、釋放全國政治犯。

李宗仁於一月二十二日視事後，提出了七項和平協商措施。四月五日，國共雙方開始談判，但中共反提出八條二十四款，完全是招降書。李宗仁表示不能接受，並主張隔江而治；但中共表示無論和戰，共軍均須渡江。在緊迫情況下，李宗仁準備接受中共的條件，後來在以白崇禧為首的華南、西南各將領的反對與國民黨黨中央也決定不對中共讓步的情形下，四月二十日和談宣告破裂。在和談期

間，中共並未停止軍事擴張；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陷天津；二十三日，華北勦匪總司令傅作義投降，共軍進入北平。至四月二十一日，鎮江下游的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投降，共軍遂在江陰以西的中港一帶渡江；四月二十三日，國府主動退出南京〈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714、716、717〉；而李宗仁在和談破裂後，負氣怠職，已引退的蔣介石又不便挺身而出，中樞頓失重心，戰局遂迅速惡化。此時，共軍兵力已發展到三百三十萬人。以後國府軍隊不斷地失利，蔣介石雖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力挽狂瀾，但終至無力挽回積敗的局勢，遂於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飛抵台北，二十七日撤守成都〈張玉法，《中國現代史》，頁 718、722〉。

國府可說是全面潰敗，美國對華態度又如何呢？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美國國務院公開發表了全文共一○五四頁的「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 ），內容涵蓋了由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九年間的中美關係。美國的目的在於對內表明「中國內戰所造成之總結果，係在美國政府控制能力之外」，以平息其國內對於「誰失去中國」之爭論與指控；對外則指責國府本身應為大陸的淪陷負完全、唯一的責任〈蔡瑋，美國對華政策之回顧與檢討 1949~1978，頁 40 〉。同年十二月七日，當國府撤抵台灣之際，美國國務院於二十三日對其駐遠東地區外交領事人員發出秘密訓令，強調台灣落入中共乃意料中，要求有關人員擬定具體情報政策，以減低當台灣落入中共手中時，可能對美國及他國所造成的損害。此時，美國政府雖然表面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但實際上，已經認定國民政府基本上已告「結束」〈蔡瑋，美國對華政策之回顧與檢討 1949~1978，頁 40〉。但在另一方面，美國則力圖和中共改善關係，謹慎小心地採取了一連串的示好探試，希望得到對方友好的回應，從而希望在適當時機能和中共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這可由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d）證實。

據司徒雷登言，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國府由南京遷廣州時，他奉令仍留居南京，以試圖與中共建立關係。同時，美國政府訓令駐中國各地領事，仍留居原地，只有一個秘書充任臨時代辦，跟著中國政府遷移。而與中國政府的外交文書，都拒絕使用「照會」，僅以「備忘錄」代替〈傅啟學，《30 年來中美關系的演變》，頁 29〉。美國的背棄中華民國政府而示好中共，達到了目的嗎？答案是否定的。事實揭開，司徒雷登的大使地位中共不予承認，且拒絕與之交涉，遂不能不於八月二日飛返美國。而駐瀋陽總領事華德（Angus Ward）及屬員四人被中共逮捕，關了四星期才加以審問，最後判決驅逐出境〈傅啟學，《30 年來中美關系的演變》，頁 29~30〉。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三日，中共又奪取了美國在北平的領事館

房屋，十四日美國只好下令撤回駐中國各地的領事館人員〈傅啟學，《30 年來中美關系的演變》，頁 30〉。一齣與中共接觸與背棄國府的鬧劇才結束。但是根據上文我們由時間順序來看，美國是與中共接觸在先，背棄中華民國於後。

肆、結論

蔣介石領導的中國，以十四年的時間與從主客觀條件皆佔優勢 、甚至與世界強國相比亦毫不遜色的日本相搏，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戰後，中國最需要的是國際友邦的經濟援助計畫，尤其美國的援助，紛受各戰難國的歡迎與引頸深盼，更遑論在前十年單獨對日作戰的國民政府；其國內民生之凋蔽、百廢之待舉，實是到了刻不容緩、亟需濟助的時刻。然而，國共內戰亦緊隨著此時而來，美國政府先後派遣了赫爾利與馬歇爾兩位特使來到中國調停戰事，然都鎩羽而歸，失敗的癥結主要是不夠瞭解國共內戰，發生戰爭的主要核心問題是甚麼？中共爭的又為何？美國是以西方政黨政治競爭來看待中國共產黨，認為它是追求土地改革、對不合理之處向執政黨提出改革的一般政黨，其目的在贏得執政，故對國民政府的要求總是大於對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而執政黨在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運作中，受到的監督與指責亦多於反對黨，這是西方政黨政治的遊戲規則，亦是常態。

但是，這樣的認知與態度，就影響到美國內部對中國國共內戰產生了正反兩極的傾向立場與評價。連帶地，在調解國共間的軍事衝突與傾聽共黨的政治訴求方面，就出現了較為同情、偏袒後者的自然現象，更影響到美國對國民政府的軍事援助。但在另一邊，蘇聯不斷地將軍需物資，輸往共軍。而美國的介入調停，「停戰協定」往往困住了國民政府軍隊的手腳，而未能為共軍所遵行；加上之前國民政府在戰後進行裁軍，未能妥善處理善後工作，被裁員的政府軍為中共所收編，反調轉槍隻向國府軍隊進攻等等，都是中國大陸失守淪陷的諸種原因。然而最為關鍵的一項發生發酵效應，使得國民政府心理受到重鎚、重傷倒地不起的就是美國在國府軍隊連連敗退之際，發表的「對華政策白皮書」，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更甚者，美國在國府政權正值風雨飄搖之時，反丟出試探與中共接觸、建交的風向球，美國之是舉，其背後當然是國家利益使然。而美國在中國擔任調停人介入國共戰爭，從其動機來看，不否認是良善的－希望中國和平，但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本國的國內事務：美國身為一個外國，就是干涉了中國的內政。歸納上述史實，國府的戰敗，中國大陸的撤守，總因有：

一、對日抗戰國府傷頹慘重，國力耗弱；

二、美國對華政局認知不清，對國共態度偏頗、不公；

三、美國對國府軍經援助多有限制，或遲滯拖扣；

四、蘇聯軍援共軍不絕，壯大了共軍；

五、「停戰協定」使得共軍的談談打打策略奏效，瓦解了國府軍隊的士氣；

六、美國發表「對華政策白皮書」，重創了國府軍民士氣與心理。

參考文獻

1. 邵玉銘，1980〈1945至1949年美國蘇聯與國共四角關係之研究〉，《美國研究》，10卷，1、2期合刊。
2. 邵玉銘，1990〈中美關係論文集〉，《傳記文學出版社》，頁46。
3. 陳毓鈞，1995，〈美國與台灣的歷史關係〉，《美歐月刊》，10卷，8期。
4. 屠傳德，1988《美國特使在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5. 張玉法，1998《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6. 張玉法，1985《中國現代史》，台北：台北東華書局。
7. 資中筠，1991《美台關係四十年》，北京：人民出版社。
8. 傅啟學，1986《30年來中美關系的演變》，台北：商務印書館。
9. 蔡瑋，1986〈美國對華政策之回顧與檢討1949~1978〉，《美國月刊》，1卷，7期。